30万人遇难！审判“定性”南京大屠杀真相

——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概述

本报记者 朱 旻





在抗日战争中，南京是一个充满悲情色彩的城市。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军事法庭，对24名乙级、丙级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判处8人死刑，2人无期徒刑，12人有期徒刑，2人无罪释放。

对罪行累累的战犯进行审判和惩处，是对无辜遇难者和无数为正义而献身的英灵的最好告慰，也是人类对世界未来命运的又一次严正声明与选择。南京审判，在1947年那个春寒凛冽的早春二月，掀起了中国对日审判的高潮。

在法庭旧址寻味历史

刚入秋的古城南京，繁华的中山东路两旁，一排排笔直的林道树流露出静穆的秋韵。8月19日，记者与参观者们来到中山东路307号励志社，步入黄埔厅礼堂。

这是一座宫殿式的大礼堂，外表红墙筒瓦，里面彩绘到顶，圆形如盖的大型吊灯上，绘制着天穹的自然色彩。这里原是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委会的场所，而在1946至1947年成为南京审判日本战犯临时法庭所在地。相关资料显示，共有24名乙级、丙级日本战犯在这个法庭接受了审判，其中8人死刑，2人无期徒刑，12人有期徒刑，2人无罪释放。

黄埔厅内，威严气派的礼堂大台，就是当年军事法庭的审判台。听着讲解员的讲述，记者仿佛看到，礼堂强烈灯光照耀下，审判台上端坐着的军事法庭审判长和法官们，仿佛看到，南京当年许多没有得到庭审旁听券的市民，聚地张在黄埔厅门前软绵绵的草坪上，兴奋地交谈、议论着，等待即将到来的历史性时刻……

法庭的组建与职责定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冬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1946年2月15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以下简称南京军事法庭）在南京成立。法庭编制为庭长一名，军法检察官两名，军法审判官四名，主任书记官一名，书记官六名。时任江苏省高等法院刑庭庭长的石美瑜以简二阶少将军衔出任军事法庭庭长，叶在增、陆起、李元庆、葛召棠等出任法庭军法审判官。

1947年2月2日，第一绥靖区司令部转告军事法庭庭长与检察官职权范围电文中明确了法庭职责：军事法庭庭长在庭所配属机关首长之指挥监督下，综理全庭行政及审判事务。军事法庭检察官在该庭所属机关首长指挥监督下，独立行使监察职权。军事法庭所配属机关首长对检察方面之行政事务，授权该管军事法庭庭长代为指导，但检察官检察权之行使，应不受干涉与限制。

严惩南京大屠杀的凶手

为了配合东京审判，南京军事法庭广泛搜集证据，对南京大屠杀中罪行最多的部队指挥官谷寿夫提起诉讼，并将其引渡到南京受审。

与其同时引渡南京受审的还有日军第16师团少尉向井敏明、野田岩等人。当时的日本报纸突出报道这两人在南京被日军占领之后进行“百人斩”的杀人比赛。

南京审判与东京审判相配合，出示了大量证据和中外证人，使谷寿夫等战犯张头认罪。虽然谷寿夫以职务定为乙级战犯，南京军事法庭经过一年的审判，判决书中定性“谷寿夫为侵华最重要战犯，尤为南京大屠杀之要犯。”谷寿夫于1947年3月10日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4月26日被枪决。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谷寿夫案的判决书指出，经过大量实地调查、采集证人证言等，认定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在30万人以上。

1947年12月4日，南京军事法庭对向井敏明、野田岩这两名战犯进行审判后，以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将他们判处死刑。

1000多人出庭指证暴行

为了把案件办成“铁案”，军事法庭在南京12个区同时张贴举证公告，鼓励目击者、亲历者站出来作证。审判期间，有1000多人为460起谋杀、强奸、纵火和抢劫案件出庭作证。证人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法庭上，并在书面陈述上签名、盖章、按指印或画押，从而宣誓所有证词句句属实。出庭的目击证人不仅有南京幸存者，也有当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负责人，包括贝德士和刘易斯·史迈士等。

据统计，1946年5月开始，南京军事法庭先后对酒井隆、谷寿夫、矶谷廉介、向井敏明、野田岩、田中军吉、田中久一等24名乙级、丙级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向井敏明、野田岩一案，是南京军事法庭审理的最后一件战犯案，它宣告法庭工作基本结束。此后，葛召棠、李元庆等几位法官，回到了各自原来的工作岗位。石美瑜、叶在增等法官，则合并到上海军事法庭，继续做日本战犯审判的收尾工作。

图①：1946年，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前排右二）等检验两花台荒地里的被害人遗骨。

图②：石美瑜等法官坐在审判席上，开庭审判日本战犯。

图③：大屠杀现场管辖经过整理，成为控诉日军暴行的有力证据。

图④：证人出庭指认战犯罪行。

图⑤：“南京大屠杀”主犯、侵华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出庭受审。

图⑥：1947年3月30日，各界人士旁听审判日本战犯。

审判日本战犯 是父亲人生的顶点

——访谷寿夫案主审法官叶在增后人

本报记者 朱 旻



叶在增法官生前照。

1946年5月开始，南京军事法庭先后对酒井隆、谷寿夫、矶谷廉介、向井敏明、野田岩、田中军吉、田中久一等七名乙级、丙级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叶在增法官主审了日本第六师团师团长、乙级战犯谷寿夫，并执笔起草了该案判决书。

叶于康先生是叶在增法官的长子，现任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理事。8月15日，74岁高龄的叶于康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一个军礼接下审判谷寿夫重任

人民法院报：请简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父亲叶在增法官的生平。

叶于康：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是传奇的一生。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朱成山馆长曾经这样评价说，叶老的一生，犹如一部大戏，有高潮有低潮，有辉煌也有暗淡，他用一生铸就了一部史书。

在他的一生中，爱国主义无疑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审判日本战犯无疑是他人生辉煌的顶点。正是因为爱国，当年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父亲能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庐山谈军会战，并担任战场指挥官。正因为爱国，当年军事法庭石美瑜庭长让他担纲谷寿夫案件审判时，20多岁的父亲一个军礼，果断而大胆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包括上世纪8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年迈的父亲写下数万字长文，告诉世人，他可以为历史作证。父亲的一生，是血性的一生，让后人发自内心敬佩。

统计出南京大屠杀被害345337人

人民法院报：您能就您的了解，谈谈叶老审判谷寿夫案的一些具体情况吗？

叶于康：父亲一生的主体角色是一名法官，他有着鲜明的法律人思维。审判谷寿夫是五人合议制，作为承办法官的他这样表态，审判过程无疑是国仇家恨的集中爆发点，审判一定是要让罪恶得到应有的惩罚。但审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如果仅是报复，也就违背了国际军事法庭向同盟国各参战国引渡战犯的初衷。审判依据的是法律，依据的是确凿的证据。

为了搜集证据，父亲每天不仅在南京各个区公所的临时讯问处奔走，还去大屠杀最惨烈的地区——南京中华门一带挨家挨户登门调查，跟随军事法庭石美瑜庭长对燕子矶、草鞋峡、中山码头、东岳庙、轿龙桥等大屠杀现场进行开掘取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从调查取证到公审，短短三个月时间，开了20多个调查庭，询问了1000多名南京大屠杀目击者、受害者和幸存者，找到了400多名证人。

谷寿夫案的判决书分量也很重，不仅要得到民众的认可，国际上的承认，更要经得起历史检验。为此，父亲和石美瑜庭长街广规商两天，两人商定，判决书“有罪部分”，除了主文、理由，事实部分一定要站得住脚，有理有据。根据谷寿夫纵兵犯罪的事实，分类定为：1.屠杀。2.强奸。3.烧焚。4.抢劫。判决书内容确定后，石美瑜庭长叫父亲执笔。父亲熬了两个通宵把近万字的判决书初稿交到庭长手中。庭长把宋书同、葛召棠、李元庆三位法官和书记官张体坤召到办公室，在草拟本的基础上讨论并签字。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南京大屠杀”被害人总数的确定。父亲的统计为345337人。会议庭考虑，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又时隔十年之久，一个概数也许更为合适。当时石美瑜庭长沉思一会儿说道，就写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吧，这样较为稳妥，经得起世人和时间的检验！

1985年8月，我陪父亲来南京参加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父亲在大屠杀纪念馆看到石壁上用中、英、日三种文字镌刻的黑色大字：遇难者300000。父亲久久凝视这个黑色的阿拉伯数字，他的眼泪浸湿了双眼。

晚年著文批驳日本右翼

人民法院报：1947年7月，国防部南京军事法庭与上海军事法庭合并，叶老就此和石美瑜庭长去了上海。相关资料提到，1949年5月上海外围战打响前，叶在增法官一直坚守军事法庭，等着上海解放，把法庭案卷和所有档案资料交给新政府。

叶于康：对的。当年我八岁，记得上海外围战打响后，一天一位美军少将突然登门造访。父亲迎客进家并与他交流后，才弄明白这位美军少将是受朋友之托，帮助我们一家去美国，并说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军舰就停在黄浦江上。

但父亲乡土情重，他不愿远离自己的祖国。至于去台湾，他对母亲说，国民党政府正因为自己的腐败，才会被小米加步枪打败。他对这个政府失望透顶，不会跟着去台湾的，况且他审的是日本战犯，没审过共产党，对新政府问心无愧。就这样，父亲在上海江湾路1号军事法庭所在地开始了一个人的坚守，整理每一份案卷和档案资料，直至交给上海军管会。

由于历史的原因，父亲后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父亲坐过牢，为了养活一大家人，在九江街头当过烟贩，拖过煤球，拉过板车。但父亲一直心情平静，保持一名法官对生活的理性。

1986年父亲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直到1994年去世，父亲人生的最后八年平静而有尊严。但就在这八年中，父亲还在为批驳日本右翼否定历史而战，先后发表《绝不容许历史悲剧重演》等文章。父亲给当时在国外的我写了很多家书，其中一封信中就谈道：“审理日本战犯让我了解到，民族自尊自强心如果到一种极致化和变态化，是非常可怕的，会带来人类的大灾难。现在很多迹象表明，日本右翼正在蠢蠢欲动，我们应该大声呼唤我们的后代子孙，千万小心！千万警惕！

南京大屠杀主犯的末日

本报记者 朱 旻



战犯谷寿夫被处决。

按照远东国际审判的规定，乙、丙级战犯由同盟国各参战国自行审理。1946年夏，第一批引渡回中国受审的日本战犯共35名，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便是“南京大屠杀”主犯、侵华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

开掘万人坑 掌握确凿罪证

为了搜集罪证，南京军事法庭组织了多次开掘大屠杀现场。

1947年1月29日，南京军事法庭对谷寿夫部队进行大屠杀的集中地点——中华门一带进行全面开掘，提取日军屠杀南京人民的确凿罪证。

宽大的土坑中，许许多多的尸骨，甚至还保持着临死前的惨状。一具尸骨从头颅到胸部被劈成两段，两边的嘴巴都大张着，显示遇难者在临死前发出了凄厉的喊叫。一具挤童的尸骨胸部被戳开，断裂处有明显的刀伤痕迹。孩子上身前倾，两手拼命向前伸着，显然是在哭喊着他的母亲……

经过三个多月艰苦、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南京军事法庭已掌握了大量侵华日军屠杀南京人民的罪证。从调查取证得到的数据统计：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用机枪集体扫射屠杀中国军民超过19万人，零星屠杀后被国际红十字会及慈善机构掩埋者达15万多人，被害军民总数达34万余人。

公审开庭 谷寿夫负隅顽抗

1947年2月6日下午，南京励志社礼堂。

下午2时许，法官们出庭坐定，台上正中端坐着审判长石美瑜，他左右手边坐着审判官叶在增、宋书同、李元庆、葛召棠。

2时整，石美瑜大声宣布开庭。

“随着一声‘带被告人！’的传唤，我看见谷寿夫由两名头戴钢盔、腰挎短枪的宪兵押着，穿过人群让开的通道，走进法庭。谷寿夫身材矮胖，体格结实，鹰钩鼻子下面留着两撇八字胡。他身穿黄呢军服，外着灰呢大衣，戴灰色礼帽，手上提着一只黄色皮包。走进法庭时脸色阴沉，做出一副镇静的样子。”审判官葛召棠之子葛文泉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1947年，葛文泉当时正在南京白下路上的“安徽中学”读初中，禁不住他一再恳求，父亲葛召棠最终带他一起进入庭审现场观看。

笔者查阅江苏省档案馆馆藏资料，了解到当时的庭审情况。

翻译全宏起诉书后，石美瑜问道：“被告人，你对起诉书中所列举的罪证有异辩之必要吗？”

“有！”谷寿夫立即从皮包里取出早在拘留所里就准备好的辩护词，“本人两次率兵来华，均系奉天皇之命向中国作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此乃常识中事。至于说我率领部下屠杀南京人民，则是绝对没有的事。起诉书中有‘南京大屠杀’一说，很遗憾，我直到休战后在东京看报纸，方知有南京屠杀事件。”

旁听席上立刻“轰”声一片。审判长石美瑜问道：“日军攻占南京时，你担任什么职务？”

被告人：“第6师团长。”

审判长：“从什么地方攻进南京的？”

被告人：“中华门。”

审判长：“中华门一带，正是日军屠杀南京居民最惨烈地区之一，被告人作为进攻中华门的第6师团最高指挥官，对你部下的滥杀无辜是最清楚的，怎么竟说不知有大屠杀一事？”

“雨花台畔，经激战两天，必定不会再有居民。当时本人所部推进的时候，好像进入无人之境，即令有中国平民，人数也不会太多。”谷寿夫继续顽抗抵赖。

听到这里，石美瑜道：“传证人！”

证人出庭 铁证如山

法庭上，从尸山爬出来的唐广普，特地赶来作证。当年他作为教导总队2团3营的勤务兵，混杂在被日军机关枪扫射后又用汽油焚烧的尸体堆中，侥幸捡得一条性命。他用亲身经历，控诉了日军在上元门大法子江滩上屠杀我军民的罪行。

受害者、幸存者、目击者一个接一个走上法庭。然而谷寿夫置若罔闻：“战争一开始，双方都要死人。至于百姓的死亡，即可能是别的部队所为，对此我深表遗憾。”

2月8日，南京励志社礼堂。

公审进行到第三天，在法庭严厉审问下，谷寿夫不再否认日军的暴行，而是把这种暴行一味推给别人。面对谷寿夫的抵赖，审判官叶在增传呼：“将雨花台万人坑中之头骨搬上来！”

宪兵每两人抬一个麻袋，把在中华门外发掘的头骨一袋一袋搬到审判台前。法医潘英才和检验员宋士豪立即走向前去，将麻袋一个个朝着听众打开，又取出8具头颅摆到审判席前的长条桌上。

法庭里一片肃静。法医潘英才报告：“麻袋中所装头骨，都是从雨花台万人坑中取来，大都有刀砍及铁器所击之痕迹。桌上的8具头颅，经检验有3具属于女性，都留有刀砍的切痕。”

“石美瑜庭长随即命令在法庭上放映日军拍摄的浙闽口屠杀现场纪录片和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拍摄的谷寿夫部队在中华门”阴近的暴行影片。当谷寿夫看到自己在屠杀现场指挥的镜头时，不得不低头承认罪行。”叶于康回忆说。

公开宣判 行刑雨花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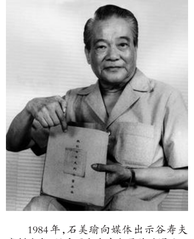
1947年3月10日，励志社礼堂。南京军事法庭再次开庭，对谷寿夫一案公开宣判。

石美瑜宣判：查被告人在作战期间，以凶残手段，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强奸、抢劫、破坏财物等暴行，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规定，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

判决书宣读完毕后，谷寿夫当庭要求复审。

1947年4月25日，南京军事法庭接到国民政府批复：“查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既据供证明确，原判处以死刑，尚无不当，应予照准。至被告人申请复审之理由，核于《陆海空军审判法》第45条之规定不合，应予驳回，希即遵照执行。”

4月26日，谷寿夫被执行死刑。



1984年，石美瑜向媒体出示谷寿夫案判决书，驳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谬论。

庭长石美瑜的历史背景

本报记者 赵 刚 朱 旻

在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有一个人物回避不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在担任庭长的两年多时间里，石美瑜共办案52件，罪大恶极的日军战犯谷寿夫、酒井隆，“百人斩”杀人竞赛者向井敏明、野田毅等都是在他手上审判，并使之伏法。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石美瑜的生平少为人知，记者检阅资料，寻找这位法官的历史背景。

从福建才子到青年法官

石美瑜，字可珍，1908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的一个商人家庭，后来考进了福建法政专门学校。

随后，石美瑜考入政治大学，至南京受训，期间参加司法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朱状元巷法官训练所，赢得了“福建才子”的美誉。毕业时因成绩优异，年仅24岁的他就被分配到上海法院任法官，因表现出色，旋调升上海高等法院任职。

37岁担负审判日本战犯重任

1946年2月，国民政府筹建军事法庭，提出在全国司法界选择绩优司法官担任庭长，并定出了选拔标准：年纪在40岁以下，担任推事10年以上，现任高等法院庭长一职。

查找之下，江苏高等法院刑庭庭长、时年37岁的石美瑜最符合上述条件。何应钦任命石美瑜为代理陆军司令部审判战犯法庭庭长，并授予少将衔。1947年4月14日，蒋介石正式任命石美瑜为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

1949年，石美瑜去了台湾，旋即从国防部军法局辞职，去做律师。

驳斥否定南京大屠杀谬论

战后，日本右翼分子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百人斩”的后人也质疑自己亲人怎么会这样野蛮凶残。

石美瑜在香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他说：“我想对这两个人的家属说的是，如果不需要证据便可以行刑，日军参与屠杀的所有军人全部都该检讨，但是，我们并没有采取报复主义！”

1983年6月，日本公开放映的纪录片《东京审判》，企图把一干战犯描绘成二次大战的牺牲者，并否认有南京大屠杀一事。这部影片还称：“国民政府初对战犯审判，并无兴趣，但为美国所迫，无奈胡乱速捕，草率审判（初审十分钟、二审廿分钟、三审定罪处决）。”

石美瑜再次对媒体声明，斥其为荒谬绝伦，与事实不符。“在中国战区的日俘共124万471人，其中列入战犯名单受审者，仅极恶大恶。像南京屠杀巨案主犯谷寿夫、跋扈港粤的酒井隆及以杀人为比赛娱乐的军曹野田岩、向井敏明等一百四十一人，都经过审慎判决，才名正典刑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石美瑜说，费时年余，搜集证据千余件及证人一千二百五十余人（包括士、农、工、商各阶层），罪证确凿。

1992年1月27日，石美瑜因心脏衰竭病逝于台北，终年84岁。

（本版部分文图资料由江苏省档案馆提供）



从一份判决书看战犯的罪行

本报记者 朱 旻

2015年8月13日，江苏省档案馆。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第一个提起公诉和审判的对象，是战犯酒井隆。酒井隆是日本侵华的重要代表人物。此人在1928年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时，一手策划和制造了济南惨案。后来，酒井隆担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中国课课长，成为著名的‘中国通’，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齐名。”江苏省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

资料显示，自1946年5月开始，经过三个多月的审理，1946年8月27日，南京军事法庭以酒井隆制造济南惨案，炮制何梅协定和指挥攻占香港、敌纵部队强奸护士，枪杀战俘为由，判定其死刑，并于1946年9月30日在南京雨花台将其执行枪决。

对酒井隆的审判是南京军事法庭首次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其宝贵的经验为对南京大屠杀战犯的审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记者查阅了酒井隆的判决书正本。判决书真实再现了酒井隆参与侵略战争犯下的累累罪行，“纵兵屠杀俘虏、伤兵、红十字会医师护士及其他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流放平民”。

判决书明确记载，“其在广东南海一带督战时，自民国三十年十一月至三十二年三月，纵兵屠杀村民无数，其姓名可考者有一百余人，均以乱枪扫射，或以刀刺冲刺。”

判决书不仅附录了死难者姓名，同时还附有“日籍之证人”等46人，足见当时调查取证之严谨。判决书还显现，相比谷寿夫、酒井隆罪恶更重。他不仅和谷寿夫一样纵兵杀人，而且亲自掳刀杀人，并参与制造济南惨案。中国外交交涉员蔡公就是酒井隆带人杀害的。

通过判决书可以看到，面对检察官的指控，酒井隆开始拒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说这些罪行都是部下所为，与他无关，他只是“督查不严”而已。经过近四个月的审讯，8月2日，南京军事法庭对酒井隆第二次开庭审判。8月27日，军事法庭依据确凿证据判处战犯酒井隆死刑。